

李商隐的《夜雨寄北》似乎对绝大多数诗人都有着某种牵引,“巴山夜雨”从一首诗演变为独特而鲜活的文化基因,成为跨越时空的情感共鸣。坐落于此的缙云山,在历史和诗篇的相互滋养中,一山、一江、一座城、一些诗,形成了“山水养人、人塑山水”的共生关系。这个地理坐标,正在以诗歌的荡漾之势向外延展,转变为日渐鲜活的文化符号。

说到缙云山,不能不说到缙云山下的西南大学(原西南师范大学、西南农业大学),西南大学的现当代诗歌传统对中国诗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。因为有前辈吴宓、方敬、吕进、邹峰等先生的引领,有中国新诗研究所40年耕耘,600多位博士和硕士从这里走出,他们已经成为优秀的诗歌理论批评家、学者、教授,包括活跃在当代诗坛的诗人李震、李怡、蒋登科、王珂、江弱水、北塔、向天渊、段从学、张德明、杨四平等,这是堪称浩荡的阵容。他们的诗歌存在与西南大学、与缙云山血肉融汇,以前如是,以后也不能剥离。

嘉陵江从源头一泻千里抵达北碚,然后流经沙坪坝、渝北、江北,最后在朝天门汇入长江奔向大海。我在长诗《水经新注·嘉陵江》里已经有过记录:“康熙年间行脚的船帮、马帮、人力帮/在米行、油行、酒家、客栈里/听他们听不懂的巴山夜雨/一壶酒可以称兄道弟/没人惦记那块似是而非的碑/北碚在上游五公里云集乱世精英/顺水而下,疑似银河落地了/小村落,李商隐只能抱恨错过。”

《中国史纲》白纸黑字写成大河/梁漱溟竹木夹壁搭建的勉仁书院/后学趋之若鹜/老舍《四世同堂》走过的石板路/石板与石板拼接京腔,没有走调/梁实秋《雅舍小品》取嘉陵水泡的茶/茶针浮动的雅,清新脱俗”。1937年,缙云山成为文化内迁的重要驿站。复旦大学迁址山下,老舍、梁实秋等文人在《北碚杂忆》中留下大量关于山的书写。山中的太虚台(太虚法师讲经处)与复旦大学登辉堂形成精神呼应,使自然空间成为抗战文化记忆的物质载体。缙云山是重庆著名抗战遗址,是重庆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,自然景观也由此成为集体记忆的叙事道具。

“缙云山诗会”从2019年开始,已经举办了六届。天南海北的诗人都来参加过。不少诗人为缙云山留下了优秀诗篇,集结成新一册的《缙云新韵》。中国有“三山五岳”之说,其中既包含自然地理,也承载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。在《缙云山寻找一个词》这首诗里,我特意打破了传统名山的符号化认知,以“缙云山不在三山五岳排位上/不说话的石头饱读诗书”,确立了这座山的价值。虽然它不在“三山五岳”之列,但文化的不可复制性让我们清晰地看见自然滋养人文创造,人文又不断赋予自然以新的意义。

《缙云新韵》这本诗集是缙云山新生的文化风景,也是缙云山文化输出的重要载体。黛湖总是不断出现在诗人的歌咏中,而金铃子的《黛湖》尤为出色,诗人将自然景观与历史文化巧妙交织,构建出一个充满诗意与情思的艺术空间。开句便以“什么样的诗句可以把一潭湖水养成青绿”的诘问,赋予黛湖诗意的灵性,将读者瞬间带入对自然与文学关系的思考。诗人以山谷、泥土、虫鸣、松鼠等意象勾勒出黛湖的生态图景,为情感抒发铺陈了静谧而富有生机的背景。李商隐雕塑的出现成为诗眼,“左手摸着胡须,如同摸着旧爱的纹理”,这一极具画面感的描写,将历史人物形象与情感具象化,让诗人的思念有了真实的触感。“拿着花朵的石雕,好像一个人,划开了时空”,巧妙地打破了现实与历史的界限,使李商隐《夜雨寄北》里的经典意象“巴山夜雨”“秋池”自然融入黛湖,实现了古今情感的共鸣。诗歌温婉的基调饱含深情,“打湿那个在长廊避雨的女子,《夜雨寄北》的诗句,散落一地”,将抽象的情感转化为具体可感的画面,黛湖的雨就成了相思的泪。“总是有人去把它拾起来。总是有人,认为。她就是那个,装得下相思的人”,如此黛湖也是那个相思的人了。相思之情在不同时代、不同人心中的延续与传承,含蓄而余韵悠长。整首诗构思精巧,叙述细腻,在黛湖的山水之间,呈现了一场跨越千年的感情对话。

萨仁图娅的《诗在你——致天琳》,以细腻的笔触与真挚的情感,勾勒出诗人与傅天琳之间的深厚情谊,同时也展现出对傅天琳独特人格魅力的赞美与深切怀念。“在这冬季收藏的时光,我才来北碚把你看望”,点明时间与地点,“冬季”一词既暗喻生命的凋零,也营造出思念的清冷。“燃一炷心香祈福隔世无分离”,借助“心香”这一意象,把思念升华为虔诚的祈愿,突破生死界限,传递出浓烈的情感。“同品娓娓道来的柠檬黄”,“柠檬黄”的色彩,增添了一抹温暖和明亮,既象征两人共度的美好时光,也暗示天琳如柠檬般清新、独特的气质。我特别喜欢“笑意盈盈的花甲女生爱美爱笑总像十六岁一样”,这样的句子冥思苦想写不出来,恰恰却是如此过目不忘。傅天琳是我在重庆称之为“天琳大姐”的诗人,“笑意盈盈”是她的标配,爱美爱花,是她留给这个世界的样子。几年前我回重庆同她见面的时候,我们喝茶、聊天,免不了聊到诗歌的话题。印象特别深的是,她说她不明白为什么那些人热衷于自己的文集,她说绝不出自己的文集,如果不写了,就编一本诗集,只选自己满意的99首诗歌,诗集就叫《傅天琳诗歌99首》。我说出版社都会抢着给你出的,我也抢着给你做这本书。她一连几句好啊好啊。读到萨仁图娅这首诗,感觉缙云山飘过的云朵里,就有傅天琳干干净净的诗句。

这座山属于川东平行岭谷的组成部分,形成于约7000万年前的燕山运动,最高峰狮子峰海拔只有1050米,明代曹学佺在《蜀中广记》里描述为“如屏风叠翠”,“晨霞未散,万壑生光”。更为重要的是,一座山丰富的人文积淀使其精神的高度始终无法丈量。一年一届缙云山诗会的坚持,让我们直观地理解了真正的诗意永远生长在自然与人文的交融之处,“巴山夜雨演绎上千年别情、隐情,有一滴留给自己够了”,而缙云山正是这一份诗意图的见证。

(作者系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副主任、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)

巴山夜雨延绵的诗意

■梁平



创作谈

关于诗歌和诗人

读诗、写诗从来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。我是被诗歌滋养、浸润着成长的。在读初中的时候就开始读诗、写诗,一直到2003年前后仍在诗歌圈。写诗有一个好处,那就是不占用什么时间,很快就能把多余的激情挥霍掉。写诗容易疯狂。本来平静、木讷、憨厚的人,因为诗歌能使内心变得狂野、傲慢、波涛汹涌,而且让人无法成熟、持重。后来,我不怎么写诗了,因为我发现写诗的天花板很高,无论我怎么蹦跳,也远远够不着。也就是说,我及时意识到写诗天赋没有自己以为得那样出类拔萃,而且越写越差。于是我转向了小说频道,从此逐渐疏远了分行的文字。但我一直为诗歌辩护,为诗歌叫好,读到好诗犹如捡到珍宝,总是第一时间跟朋友们分享。后来我写下的文字,都是从诗歌的酱缸里捞出来的。

诗人跟普通人没有区别。我不觉得诗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,甚至不是一个“群体”。各自写点诗,就像在家里自酌几杯,不呼朋唤友,不扎堆,不让外人知道。我认识的写诗的朋友,有官阶很高的,有财富惊人的,也有贩菜的、看门的,还有一直在村里种地的。诗歌面前人人平等。有些觉得自己是诗人,还有些不承认自己是诗人;写诗不一定就是诗人,不写诗也不一定不是诗人。以诗人自居其实是一种理想。而理想是稀缺资源。

《蛋镇诗社》虽然披着“诗”的皮,但并不是写诗歌和诗人,或者说,我志不在此。我不喜欢调侃、嘲讽或赞美文人的小说,并向来警惕以文人作为书写对象的文学作品,哪怕是配角。除非不得已,我不会让文人走进我的小说。但作为小说家,也不必刻意回避任何题材和人物,毕竟,向读者准确充分表达你的奇思妙想才是最重要的。请勿低估一个年过半百小说家的锐气。他还有野心,还有余勇,还有“素人写作”的莽撞和真诚,尤其是诗人出身的小说家。“诗社”只是墙上的钉子,用来悬挂小人物的故事。我是想写一部关于普通人的书,与理想有关,与激情有关,与柴米油盐有关。它是滑稽的、荒诞的、夸张的,又是真实的、内敛的、苍凉的,充满了隐喻和黑色幽默。

诗坛依然热闹,人人都争相对诗歌发表见解。诗歌并非天生高雅和高贵。“高雅”和“高贵”甚至是对诗歌的偏



《蛋镇诗社》,朱山坡著,花城出版社,2025年6月

见和伤害。这种颠覆性的观念在诗人中早已经解决,成为他们的共识,但大多数普通读者依然固执己见、墨守成规。人们希望从诗歌身上获取力量,但诗歌的力量远不止我们所认为的那样。我试图把诗歌的外套一层层脱掉,让它在闹市中奔跑。请勿误会我在贬损诗歌。内心的干净更重要。

关于诗社

诗歌是诗人的冲锋号;诗社是诗人的集结号。

1987年前后,我还在镇上读初中,接触到了现代诗。镇上一个诗人告诉我,他和几个年轻人成立了一个诗社,准备铅印诗报,“合适的时候”邀请我加入。我十分期待,希望成为诗社的得力干将,越快越好。从此步入传说中的诗坛,意味着有了与世界上所有诗人平起平坐的身份。然而,我从没见过诗报,诗社我还来不及加入便很快解散了,那些成员各奔东西,我从没见过他们。那时候,他们并非就一定无比热爱诗歌,只是过剩的激情需要发泄,虚无缥缈的理想需要安放,在浩瀚的世界里需要存在感,诗社刚好能成为他们临时的“收容所”。一旦找到合适的去处,他们便与诗歌挥手告别,走向真实的人生,成为沧海一粟。但我一直认为他们是

那时候的小镇英雄。如果没有他们,“蛋镇”将黯然失色。后来,2000年前后,进入了互联网时代,“民间”诗歌在全国异军突起,“诗歌论坛”和“诗歌民刊”呼风唤雨,让人眼花缭乱。那是一次诗歌写作的大解放,是一次诗歌大众化、平民化的狂欢,是诗人打破地域和身份壁垒在互联网上掀起的风暴。我加入了县城的“漆诗社”,跟伙计们“玩”起了诗歌,组织诗歌活动,狂热甚至疯癫地迷恋与诗歌有关的一切。那几年,我们组织了第一、二、三届广西青年诗会和华南诗会等等,几乎扛起了一个地区的诗歌大旗。尤其是混迹各种诗歌论坛的那几年,热闹非凡。我是“漆诗沙龙”论坛的轮值“班竹”,经常在诗歌论坛上贴诗、读诗、辩论,或实名,或匿名,或换马甲,互相吹捧,称兄道弟或吵得不可开交。当时我在县政府办公室上班,住在政府大院。有时候半夜接到朋友打来的电话,火急火燎地说某论坛上有人骂我们了,你赶紧帮忙怼回去,有仇要马上报,不能过夜。我慌乱地穿着睡衣出门,摸黑穿过堆放着垃圾的过道,急匆匆的脚步惊吓到了正在忙于觅食的老鼠,甚至绊着往家里搬运口粮的它们,引发一阵尖锐、凶狠的“责骂”。我顾不上道歉,赶到办公室。给286电脑开机一般要三分钟,缓慢的网速快要耗尽耐心,我快要又睡过去。找到网页,把骂我们的贴一一怼回去。巡夜的保安以为是小偷,在外用手电筒的强光打在我的脸上并质问干什么来了,我说紧急加班,准备明早的领导讲话稿……当年很多曾经在论坛上互相“问候”过对方的诗人后来都成了好朋友。几年前,应《南方周末》的邀请,我曾经写过一篇《一个地方诗社的兴衰——漆诗社纪事》,记录了跟伙伴们鼓捣诗社、“玩”诗歌的那段往事。回想起来,觉得异常幼稚、荒唐,都是蛋壳里的风暴。但脑海里关于它们的每一帧“照片”都金光闪闪,每一个细节都成了现在我们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笑谈。我们如此渺小、卑微,办过诗社、玩过诗歌已经是这辈子干过的屈指可数的“大事”了。而在全国和全世界,像我们这样的人还有很多,他们也许比我们更狂热更荒唐更持久。他们,还有我们,都是曾经给世界带来诗意的人。这个时代,这个世界,对诗意的需求远超石油和武器。因此,《蛋镇诗社》既致敬他们,也致敬自己,致敬所有给世界

带来诗意的人。

关于蛋镇

一开始写小说的时候,我虚构了一个“米庄”,明眼就能看出来是我家乡的村子。在粤桂边上,与高州、化州接壤。当挖空了“米庄”之后,我努力构建一个更宽大更驳的空间。因此,在创作长篇小说《风暴预警期》的时候临时搭建起了“蛋镇”。是以我的家乡小镇作为蓝本。“蛋”意味着封闭、脆弱、孤独、压抑、焦虑乃至绝望;同时也意味着纯净、肥沃、丰盈、饱满,孕育着希望,蕴藏着生机,一切都有可能破壳而出,创造自己的宇宙。它是一个巨大的隐喻。我很认真地建构它。南洋大街、芒果大街、骑楼街、状元坊、观音巷、菠萝巷、电影院、灯光球场……像是搭建一个坚固而缤纷的舞台,把它变成“我的蛋镇”,掀起“蛋壳里的风暴”。当时并没有想到后来会写“蛋镇”系列,直到我创作《蛋镇电影院》时,它的确帮我打开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世界,它变得更宽阔更深邃了,我意识到它是“朱山坡的蛋镇”。在写《蛋镇诗社》的时候,我把它高举至“世界的蛋镇”来经营。台风、电影、诗歌,成为蛋镇挥之不去的标签。至此,我不经意间完成了“蛋镇三部曲”,分别是在南宁、北京、广州写下的。我并不是“三部曲”的执着追求者,只是碰巧写了三部。“蛋镇”系列本来可以一直写下去,一直写到鸡飞蛋打。但是,世界那么大,我想到别处去看看。

我在寄给朋友们的书扉页上经常写上“欢迎光临蛋镇”。在我心里,它已经真实存在,就差朋友们的认可和喜爱了。

(作者系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专业作家)



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

LITERATURE SUMMIT PLAN FOR A NEW ERA

土地与人共同谱写的希望之歌

——读长篇小说《又是豆花飘香时》

□陈德民

源俊的长篇小说《又是豆花飘香时》以其浓郁的地域气息、深切的现实关怀和饱满的人物群像令人印象深刻。作品以东北柳毛沟村为舞台,通过田黑子返乡创业、土地流转风波以及村民在时代浪潮下的信念与坚守,勾勒出一幅复杂而真实的新农村图景,在豆花飘香的地球上谱写了一曲深沉而明亮的变奏曲。

小说深刻把握了转型期乡土中国的核心命题——土地与人。土地不再是简单的生产资料,而成为资本博弈的焦点、身份归属的象征、情感维系的纽带。田黑子与赵大胡子围绕土地承包的激烈竞标,表面上是经济利益的争夺,深层则是两种生存逻辑的碰撞:传统小农经济的保守与规模农业的冒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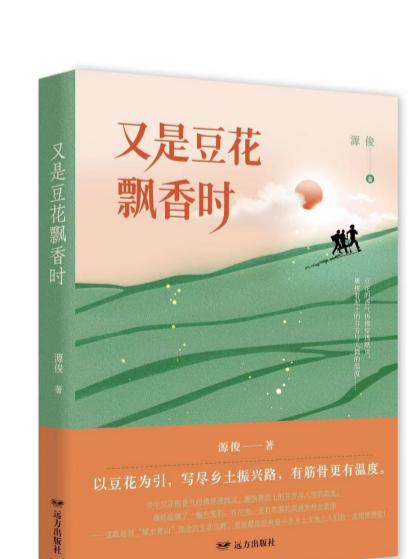
小说并未简单评判孰优孰劣,而是通过代理村主任的摇摆、村民的观望,以及后续政策变化引发的反复,真实展现了土地流转的复杂生态。田黑子托管模式的尝试,更是对土地集约化经营中个体农民权益保障路径的思考。在豆花飘香的地球上,作者敏锐捕捉到生产关系变革的阵痛与希望,土地承载着传统与现代的撕扯,也孕育着新生的希望。

田黑子无疑是小说着力塑造的人物。这个曾被误解为有道德缺失的农民,其形象在叙事中不断被解构与重构。他返乡的初心带着些许理想主义的冲动,却因“傻女事件”的阴影而步履维

艰。作者通过田黑子对孙老蔫一家的默默资助,展现其隐忍与担当;通过他与赵大胡子的土地之争,揭示其倔强与坚持;通过他毅然托管土地、自购农机,彰显其魄力与责任。尤其当旱灾来临,他甘愿承担毁约损失,将前期收益“借”给困难户买化肥种子,令人动容。田黑子身上既有中国农民传统的坚韧与朴实,又闪烁着新时代农民敢于探索、勇于担当的精神光芒。他与柳白芍情感的波折,亦是对乡村个体在现代化进程中精神归属的探寻。豆花飘香时,他真正扎根的不仅是土地,更是那份被乡情与责任唤醒的自我认同。

小说的丰富性更在于其塑造了鲜活的柳毛沟人物群像。从精于算计又重情重义的赵大胡子,到市侩圆滑又试图有所作为的代理村主任;从善良隐忍的孙老蔫,到狡黠自私又带点可爱的周五;从坚守岗位的梁向英,到深陷情感困境的柳白芍……这些人物没有简单的正反派标签,他们带着各自的局限与光芒,共同构成了乡村社会的真实肌理。他们的喜怒哀乐、利益纠葛、互助与猜忌,织就了一张充满张力的乡土人情网络。正是这些血肉丰满的人物,让柳毛沟村超越了地理符号,成为一个充满烟火气与生命力的精神共同体。豆花飘香的柳毛沟,不仅是地理的坐标,更是乡土中国在时代洪流中寻找自身定位、重塑精神家园的生动缩影。

源俊以深沉的笔触与温暖的关怀,在《又是豆花飘香时》中为读者呈现了一个挣扎蜕变而又充满韧性的当代乡村。这里有土地流转的博弈,有人心的冷暖,更有在困境中闪耀的人性光辉。豆花飘香的柳毛沟,不仅是地理的坐标,更是乡土中国在时代洪流中寻找自身定位、重塑精神家园的生动缩影。作者没有回避乡村转型的阵痛、人性的复杂和现实的沉重,而是以深情的笔触和冷静的观察,刻画了柳毛沟村在时代浪潮中的前行与坚守。书中的人物在豆花的香气里憧憬,在干旱的焦灼中抗争,在水库放流的希望里重生。可以说,这部作品不仅是对东北乡村的深情记录,描绘出了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



《又是豆花飘香时》,源俊著,远方出版社,2025年5月

山”的现代农村生活画卷,更是对新时期中国乡土社会变迁的一次深刻而温暖的文学叩问,其回响将在豆花年复一年的飘香中,久久回荡。土地与人共同谱写的希望之歌,正奏响在新时代的广袤大地上。

(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)